



道家与汉代士人思想、心态及文学

陈斯怀 著

齊魯書社

陈斯怀 著

道家与汉代士人思想、心态及文学

本书由河北师范大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齐鲁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道家与汉代士人思想、心态及文学 / 陈斯怀著. — 济南: 齐鲁书社, 2010. 12

ISBN 978 - 7 - 5333 - 2474 - 2

I. ①道… II. ①陈… III. ①道家—哲学思想—关系—古典文学—文学研究—中国—汉代 IV. ①B223.05 ②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32919 号

道家与汉代士人思想、心态及文学

陈斯怀 著

-
- 出 版 齐 鲁 书 社
社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 编 250001
网 址 www.qlss.com.cn
电子信箱 qlss@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80 × 1230 / 32
印 张 12.875
插 页 3
字 数 321 千
版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5333 - 2474 - 2
定 价 39.00 元
-

序 一

重读斯怀《道家与汉代士人思想、心态及文学》，不禁想起了在一起相处的日子，那应该是斯怀还在读博的时候。斯怀喜欢读书，知识面甚宽广，且长于理性思辨。为人处世，远离世俗，颇多超拔风致。这或许是他选择研究道家思想的内在的原因了。

最终确定研究道家与汉代士人思想、心态及文学，自然还与受专业领域的限定有关；此外，我也觉得该问题仍有较大的研究空间。虽然研究汉代道家的论著已经有很多，研究汉代士人心态的论著也有很多，从道家角度论及汉代士人心态及文学的论著也不在少数，其价值和意义当然是客观存在的，但仍然有不深不透的感觉。如果能在较多地展示出了道家影响及汉代士人思想、心态及文学的现象的基础上，在更深层次上提出某些理性化的思考，则将必然对该问题的研究起到深化的作用。

斯怀经过了三年的钻研，又经过两年多时间的修改，展现在我们面前的这部《道家与汉代士人思想、心态及文学》的论著，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这种深层理性化思考的结晶。其思考问题的理路和方法，其研究该问题所得出的理性色彩甚浓的结论，都将该问题的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认知层面。

我觉得，斯怀思考问题的广度和深度是应该充分肯定的。第一，针对以往论著大多存在就道家言道家的不足，他提出，儒道

两家在产生之时，就异中有同，同中有异，且在汉代的发展过程中相互纠葛，或对立，或融通。因此，尽管是从道家的角度切入研究汉代道家的表现、影响，也不仅应该而且必须同时考虑道家与儒家的互动关系。也就是说，必须在儒道互动的视域内，才能准确透析道家在汉代的内容、地位和作用。其次，与以往论著相同，他也注意到了作为思想观念形态的儒道两家在汉代的发展演化，必然地与汉代的政治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但他的思考并非单一地强调道家对政治的影响，而是结合汉代政治的变迁，梳理出汉代儒道两家互动的阶段性，以及准确描述出这种阶段性的特征，并把握在阶段性特征总的框架下，道家是如何浸润到汉代士人的思想、生活，以及心态的变化的方方面面。第三，他又提出，汉代的道家是从先秦的道家发展演化而来的。先秦的道家与儒家异中有同，同中有异；同样，汉代的道家与儒家也同样异中有同，同中有异。追本溯源，从研究比较先秦道家与儒家的异与同出发，他将其中的相同相通之处，归纳并上升为理性层面的某些概念、命题，以透视汉代道家影响及汉代士人思想、心态的具体表现。这种认识和属于理性层面的归纳概括，不仅使得观察汉代“儒道互动视域”下道家的表现，具有了可操作性，而且能够从道家演化的源流上看出其对汉代士人思想、心态的影响。第四，道家对汉代文学的形成与发展，无疑具有深层次的影响。为了具体展现这种深层次的影响，斯怀结合道家的特征及其在汉代的发展状况，寻觅并厘定出与之相联系的受道家影响所呈现的汉代文学的某些面貌。更为重要的，他提出道家自由的生命意识，隐处与戒慎的心态等，这些属于理念的以及理念驱动下的具体活动范式，是道家深层次影响汉代文学的突出表现。总之，斯怀从上述既具广度、又有深度的四个方面，思考道家与汉代士人思想、心态及文学问题，虽然仍是从道家的角度切入，研究道家对

汉代士人思想、心态及文学的影响，却无疑是在对先秦至汉代儒道发展的纵向把握中，在对汉代儒道思想的全方位的观察中，在对汉代的儒道演化、政治变迁、士人思想及心态以及文学发展等多维的联系中，提供出了对该问题的深层的思考，其思考问题的方式和思考的结论，都能给人以深刻的启示。

或者是受这种思考问题型的研究方式的限制，应该说该论著不属于高头讲章式的鸿篇巨制，也不像有的专著先打造某种理论框架，在框架中分门别类地“填充”内容，而更类似于深化该问题的专题性研究。如果一定按照专著制式规矩去要求，或有其不足；但这又恰恰提供了研究问题、论析问题的方便。我认为概念界定的严格准确和论述的深与细，是该论著最突出的特点。正是在纵横多维的把握中，用娓娓道来的方式，展现出作者缜密而又深刻的思考。

至于论著中的具体观点、结论，择其要者胪列于次。其一，该书认为“无为”政治思想在汉武帝执政的中期出现转折，由之前的以道家为主导变为西汉中后期的儒道共存、融合的局面，儒家德政式的“无为”对士人的影响明显加强，并且特别指出“无为”成为美政的习用语而明显存在于东汉中后期的碑文中，道家的清静精神被纳入儒家之中。其二，该书将庄子在汉代的流传与影响梳理为四个阶段，既注意到汉武帝后期至汉成帝前期士人与《庄子》的接触多表现为知识性的了解与运用，又肯定了庄子其人其书在汉代的各个阶段以不同的程度影响及士人自由思想与心态的形成。其三，该书认为隐处是两汉士人重要的人生态度，这种态度与《周易》、道、儒关系甚深，而道家的隐处思想贯穿及避患全身、怡情养性、追求个体生命自由等方面，从而推动士人私人空间的构建。其四，该书指出先秦以来的戒慎思想传统对汉代士人戒慎心态的养成影响深刻，《周易》与道家在其中起到的

作用尤为明显。既注意到戒慎心态在汉代士人中大量存在，又特别指出戒慎的处世方式在功高权重或地位显赫者那里尤为突出，而以两汉开国之初的功臣与贵戚的表现尤显典型。其五，该书认为道家的生活形态、思想追求、人生境界带有明显的“游”的内涵，它影响所及的汉代士人的自由生命意识、隐处与戒慎的心态即含有“游”的精神，由此推动汉代士人文学对“游”之精神的抒写。主要受道家影响而来的“游心”成为汉代士人文学的重要内容，并主要表现在《淮南子》、士人的书信和辞赋中。我相信，对这些见解读者自可得出自己的认识，但它们属于作者深思后的所得，则是确定无疑的。

去年春节，斯怀寄来贺年卡祝贺新春愉快。在此之前，我不断从河北某一重点高校得到信息，说斯怀的教学、科研工作，以至于为人处世，都得到了领导和同事们的认可。作为斯怀的老师，我当然十分欣慰。当即赋诗一首并书赠斯怀：“泉城品酒味犹香，石市谭文夜正长。堂阔兴浓抒意气，室贫自在著华章。儿娇憨态扶床走，妻惠娉婷理旧忙。更盼宏图多建树，文坛信步不思量。”我知道，诗中之意不乏舐犊情深之嫌，但的确是最真实的情感。据我对斯怀的了解，我相信他能够在自己所钟爱的高校教学、科研的岗位上，自强不息，勤奋耕耘，为国为家，为人为己，不断地取得可喜的业绩。

是为序。

王洲明

2010年6月28日

于山东大学五宿舍

序 二

那年冬天，照例举行我为本科生开设的中国古代文学课的期末考试，有个男生第一个交了试卷，瑟瑟地从我身边跑过，操着一口南方腔嘟囔着“好冷啊”。一般来说，早交卷的都是答不好的，可等我批试卷时却发现这个男生居然全班考了第一，97分，于是记住了这个男生。不过大学本科教学，批完试卷也就等于结束了与这些学生的联系。第三个学期轮到我的先生为他们上美学课，有一天，他批作业时兴奋地对我说发现这个班有个水平很不错的学生，将来想招他做研究生，一问，原来又是这个男生。缘分这个东西还真是奇怪，隔年招一次硕士生的我今年正好轮到招这一级，而他作为基地班推免生，报的又是古代文学，于是我点名把他招到了门下。

这个男生读完硕士读博士，读完博士进高校，如今已是跟他导师一样的一位大学教师，这对他来说原是顺理成章的发展路径。读书对他来说是享受，思考对他来说是兴趣，写作对他来说是习惯，表达对他来说是特长，这些加在一起，在大学里从事教学与研究，可以说是再适合不过的一种选择了。短短几年，据说他已成为颇受学生认可的老师，这完全在我的预期之中，现如今，他又将一部厚重的著作呈现在大家面前。

不用说，这个男生就是本书的作者陈斯怀。

读书人、学者其实有两种类型，研究型和才子型，斯怀更属于后一种。他是个“书虫”，什么书都想看，什么书都想买，还在读本科时书已经买了一书架；他的兴趣绝不仅限于文学，他的关注点也绝不止于先秦两汉，读硕士时两个师姐对他的博学多知、海阔天空佩服得五体投地。不过这也导致了他的思维往往是发散式的，很难专注于对一些具体的细节深入探究和考证，为了扭转这一点，没少费工夫。这种训练是应该的，才子型加研究型才是成为大学问家的材料。这种训练也是颇见成效的，学术专著出炉就是见证。

说起来，道家在汉代，道家与士人，这的确算不上什么新题目，不过，无论什么题目到了才子型加研究型的人笔下，都会是新题目，或者说都会有新内容。才子型的博览群书决定了会比一般学者思路更加开阔，联系更为广泛，他们不按常规出牌，往往会比按部就班做学问的冒出更多让人意想不到的别样见识和思想火花；研究型的专注和严谨又会补足才子型的宽和泛，使别样见识不再只是别样而变成独到，使思想火花不再只是火花而变成火种。斯怀的这部著作，《道家与汉代士人思想、心态及文学》，从书题即可看出这是一个大文化的选题；“无为：道家与汉代士人的政治思想”、“自然：道家与汉代士人的生命观”、“自由：庄子与汉代士人的思想及心态”、“隐处：汉代士人的一种自我安顿”、“戒慎：汉代士人的一种处世态度”、“道家与汉代士人文学的‘游’之精神”、“道家与汉代士人文学的奇譎宏肆之风”，从章题更可看出它不是对史料的爬梳、考证和汇总，而是按专题展开对问题的思考、研究和感悟。应该说，这是很适合作者口味和特点的一种结构，这既可以纵横捭阖，谈天说地，又可以就某个具体的事件、行为追根究底，还能自由抒发一己之所见所感，比如说到《淮南子》描写种种神人、真人、至人、圣人的无拘无束，

作者联系淮南王的处境，说“里面不仅有大自在、大自由的生命快乐，也有压在这快乐背后的沉重感喟”，这就属于作者自己的语言。

当然，这毕竟只是斯怀的第一部著作，距离大学问家的著述还有不小的距离，只是既然选定了这条道路，成为大学问家就是你的目标，不管最终你距这个目标是近还是远，朝着这个方向走是一定要坚持的啊！

廖群

2010 年 7 月 27 日

前 言

春秋、战国以来兴起的诸子思想在汉代得到不同程度的延续和发展。纵横家入汉之后，逐渐失去现实的环境，从思想与行事的角度看，它主要延续于西汉初期的战国余绪中。名家的核心内容名实思想早在汉代之前就已逐渐被儒、道、法诸家所吸收，到了汉代，名家虽然不绝如缕，但是作为思想流派的名家已显得身影模糊。曾经和儒家同为显学的墨家进入汉代之后，也变得比较沉寂。比较特殊的是阴阳家，它在汉代影响深广。如顾颉刚所说：“汉代人的思想的骨干，是阴阳五行。无论在宗教上，在政治上，在学术上，没有不用这套方式的。”^①余英时谈到汉代思想时也说：“阴阳五行的观念则尤其如水银泻地，无所不在。”阴阳家的阴阳五行观念的这一普遍而广泛的影响，使它成为汉代社会的一般知识，成为普遍性的思想观念或思维方式。所以，余英时接下来的一句话值得注意，他说：“不过阴阳五行说所提供的主要是一个宇宙的间架：儒、道、法三家虽都采用其间架，基本上却并未改变它们关于文化、政治、社会的理论内容。”^②一个思想

① 顾颉刚著：《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1月版，第1页。

② 余英时著：《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140页。

派别的核心思想成为诸家的共同思想工具和共享观念，一方面固然表明其影响力极大，另一方面，它自身的独立性在一定程度上也就被消解了，倒是那些既容纳其他因素而又保持自身基本观念的思想流派得以一直流传。

在汉代，可以称之为主要思想流派的，应该还是儒、道、法三家。其中，法家更多地体现于具体的政治运作或指向现实的政治领域，在型塑士人的文化——心理方面，影响更为深层的大概要数儒、道两家，这两家在汉代的传衍也确实表现得相当突出。

不待汉武帝“独尊儒术”，即使经历秦火及秦末、楚汉的战乱之后，儒家在西汉初期仍拥有不容忽视的力量。被儒家奉为经典的“五经”虽然有所散佚，然其传承各有统绪，由《汉书·儒林传》所记即可见其时“五经”传承有人。其时民间修习儒学的人数更当不在少数，如《史记·儒林列传》所说：“及高皇帝诛项籍，举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①战时尚且如此，天下大定之后其传承之得以延续不难想象，至少，从陆贾著《新语》和贾谊作《新书》时对“五经”、“六艺”的熟悉可以略窥当时的儒学“教育”不会冷清。直至汉武帝时以官方的形式将儒学奉为一尊，而后士人多以儒学为务，“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②，一直到汉代结束，儒学（经学）就成为汉代的主要思想文化形态，尽管其中有许多曲折变化，要在并未改变其主流地位。清人皮锡瑞撰《经学历史》有“武、宣之间，经学大昌”、“经学自汉元、成至后

① [汉]司马迁撰：《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11月版，第3117页。

② 司马迁：《史记》，第3119～3120页。

汉，为极盛时代”^①之说，这是对当时思想文化形态的中肯评价。

道家在汉代虽不如儒家兴盛，却也是儒家之外另一主要思想文化流脉。唐代韩愈历数儒家道统在各时期所受干扰与冲击，至于有“黄老于汉”之说。^②清代的洪亮吉也说：“自汉兴，黄老之学盛行，文景因之以致治。至汉末，祖尚玄虚，于是始变黄老而称老庄。”^③他对老庄兴起时间的论断或有可商，但是对黄老之学在汉代的重要性的认识自有合理之处。尽管黄老的突显期主要在西汉初期的六七十年间，但一直到两汉结束，修习黄老之学的人还是时时见载于史籍之中，其间的思想倾向且有不少变化，大的倾向是由政治转向人生。^④与此同时，《庄子》在汉代的流传也一直没有断绝，有的时候还相当明显。汉初的

① [清]皮锡瑞著，周予同注释：《经学历史》，中华书局2004年7月新1版，第56、65页。

② 韩愈《原道》：“周道衰，孔子没。火于秦，黄老于汉，佛于晋、魏、梁、隋。”[清]沈德潜选：《唐宋八大家古文》，中国书店1987年4月版，第1页。

③ 陈澧著：《东塾读书记（外一种）》，三联书店1998年6月版，第238页。

④ 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秦汉）》，人民出版社1985年2月版，124~132页，“四、黄老之学在汉代的流传和演变”部分。特别注意其中“西汉的黄老学者”与“后汉的黄老学者和崇奉黄老者”两个人物列表。日本学者秋月观暎在《道教史》中说：“本来在中国思想史上，黄老观念表现出丰富多彩的特点。战国末期最早出现的‘黄老’是倡导清静无为的政治术，是‘安集百姓’的所谓‘黄老之术’。西汉末进入东汉以来，表现为‘黄老之学’，即宣扬处世哲学的黄帝老子的道家哲学。进而表现为‘黄老之言’，即宣扬仰慕神仙、长生不死术的神仙黄老观念。至东汉末，黄老观念被当作‘黄老之道’，即叩拜、祭祀黄老君，祈求长生福祥。”[日]福井康顺、山崎宏、木村英一、酒井忠夫监修，朱越利译：《道教》第一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6月版，第31页。

贾谊、《淮南子》那里都留有《庄子》的深刻印记，由西汉后期的严君平、扬雄开始，《庄子》的流传与影响也是日见突出，至东汉后期，其流传更显广泛和深入。道家在汉代的重要地位还可由徐复观的一段话看出大概，他说：“由《六艺略》及儒家者流，可知汉代儒术之盛。道家三十七家，仅次于儒家，《老子》已有四家的传、说，可知道家思想在西汉的流行。名家七家、墨家六家，其中皆无汉人著作，可知此两家在汉之微。”^①

既然儒、道两家在汉代地位如此重要，如想深入了解两汉士人及其文学创作，它们无疑是需要被加以深切关注的内容。本书即试图以道家为问题的切入点，探讨道家与汉代士人思想、心态及其文学创作的关系。

关于道家与汉代士人关系的研究，不管是专著还是论文，数量都十分可观。众多的研究论著根据观照问题角度的不同，概略可分为三类：其一，道家与汉代士人创作研究；其二，汉代道家思想研究；其三，汉代士人研究。

第一类研究主要有尚学锋的《道家思想与汉魏文学》、王萍的《道家思想与汉代史学》、张松辉的《先秦两汉道家与文学》等。^②尚学锋的著作跨越汉魏，分四章，先从“精神境界”、“自然人生”的角度讨论道家思想对汉魏文人的精神及人生态度的影响，再分赋作、诗歌和散文三种体裁分别讨论道家对它们的影响，既涉及文艺思想，也包括作品所表现出来的道家精神与情怀，甚至于汉晋之际的文风。态度比较客观、平

① 徐复观著：《两汉思想史》第三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12月版，第314页。

② 尚学锋著：《道家思想与汉魏文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9月版。王萍著：《道家思想与汉代史学》，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8月版。张松辉著：《先秦两汉道家与文学》，东方出版社2004年11月版。

实，而且能兼顾儒家的影响，但是在勾连彼此关系时，对道家文献流传的确切证据不是特别关注。王萍的著作以“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①为契机，追寻道家与先秦史学的关系，进而讨论道家对汉代史学的影响，主要涉及道家思想在司马迁、刘向、刘歆、班固、荀悦等人的治史中的个性化表现。缺陷则如孟祥才在该书序言中所说：“本书的著者对道家是充溢着钦佩、激赏和挚爱的感情的。这或许在一定程度使其对道家思想给予两汉史学影响的估价有过头之嫌。”^②张松辉的著作涉及道家与先秦两汉文人关系的考辨，并且从道家与汉赋、诗歌、史传文学、小说等方面探讨它们之间的关系。该书较有新意，比如认为《老子》二十章为楚辞雏形，宋玉为道家文人，《沧浪歌》初创权属于文子，《庄子·盗跖》是中国第一篇招安小说等等，其创新主要集中在先秦部分。汉代部分较新颖的见解是认为五言诗、七言诗最早起源于道家（道教），前者为魏伯阳的《周易参同契》，后者为干吉的《师策文》等传道诗。

此外，李炳海的《道家与道家文学》、钱志熙的《唐前生命观和文学生命主题》、李生龙的《道家及其对文学的影响（修订本）》等著作也都有涉及汉代的内容。^③李炳海的著作时间跨度很大，讨论的时限基本是整个古代中国，偏重于理论性的概括

① 《汉书·艺文志》，[汉]班固撰：《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6月版，第1732页。

② 《道家思想与汉代史学·序》，王萍著：《道家思想与汉代史学》，第2页。

③ 李炳海著：《道家与道家文学》，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5月版。钱志熙著：《唐前生命观和文学生命主题》，东方出版社1997年6月版。李生龙著：《道家及其对文学的影响（修订本）》，岳麓书社2005年1月版。

和探讨，汉代士人的创作以分散的形式存于书中。钱志熙既单独谈到先秦道家的生命观，又将之融入到对汉代文学生命主题的讨论。李生龙的著作有一半的篇幅是专门论述先秦道家，后面则纵论其与历代文学的关系，涉及汉代者有“汉初黄老理论的实施及总结”与“道家思想与汉代文学”各一章，论述比较简略。

论文数量较多，像张运华的《从〈太玄〉看道家理论思辨对扬雄的影响》、梁宗华的《董仲舒新儒学体系与道家黄老学》、刘周堂的《道家人生哲学与汉代文人》等都在相应的问题上有较好的探讨。^①

第二类研究比较突出的专著有：崔大华的《庄学研究》，熊铁基等的《中国老学史》和《中国庄学史》，熊铁基的《秦汉新道家》，陈广忠和梁宗华的《道家与中国哲学（汉代卷）》，方勇的《庄子学史》等。^②

《庄学研究》论及《庄子》与汉代经学的关系，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以自然观为主的思想（命题、概念）的蹈袭、思想资料的援用、训诂时的名物引证。其中，对《韩诗外传》援用《庄子》的三种方式有相对集中的讨论。《中国老学史》

① 张运华：《从〈太玄〉看道家理论思辨对扬雄的影响》，《唐都学刊》，1999年第1期，第19～21页。梁宗华：《董仲舒新儒学体系与道家黄老学》，《齐鲁学刊》，1999年第6期，第32～37页。刘周堂：《道家人生哲学与汉代文人》，《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第18～22页。

② 崔大华著：《庄学研究》，人民出版社1992年7月版。熊铁基、马良怀、刘韶军著：《中国老学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年7月版。熊铁基、刘固盛、刘韶军著：《中国庄学史》，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10月版。熊铁基著：《秦汉新道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3月版。陈广忠、梁宗华著：《道家与中国哲学（汉代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6月版。方勇著：《庄子学史》第一册，人民出版社2008年10月版。

设《秦汉时期的老学》一章概述《老子》在秦汉时期的流传及影响，并对严遵、《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进行单独讨论。《中国庄学史》列有《秦汉时期的庄学》专章，并以“潜行的《庄子》”为题，比较全面地概述《庄子》在汉代的流传过程，书中还单列《〈吕氏春秋〉、〈淮南子〉与〈庄子〉》、《〈庄子〉思想对儒学的渗透》等专节，进一步论述《庄子》在汉代的影响。《秦汉新道家》最突出的特点是提出“新道家”这一概念并将之贯彻到整部著作之中。该书主要讨论秦汉时有别于先秦道家与老庄道家的“黄老道家”——新道家。全书分“历史篇”与“思想篇”，前者以历史为线索，纵论新道家从先秦到汉末的历史演变轨迹，后者主要以重要著作和重要人物为单元分析其存在的新道家思想。特点是带有明显的系统性，论题较为突出且深入，而且将《吕氏春秋》、《新语》、《淮南子》等著作明确视为新道家的代表作。《道家与中国哲学（汉代卷）》主要以重要人物及著作为中心，讨论汉代道家思想的存在情况，其中特别注意到黄老道学向玄学及宗教的转化，并论及道家与科技的问题。《庄子学史》列有《秦汉辞赋、儒学、医学对〈庄子〉的多所吸纳》、《〈淮南子〉对庄子的多所阐释》和《汉代诸学者的庄子研究》（包括刘安、司马迁、班固）三章，详细论述了汉代庄学的发展状况。该书的材料考索十分翔实，所涉问题也相当全面，对《淮南子》与《庄子》的关系的探讨尤其深刻。

另有其他部分思想史与哲学史著作也涉及汉代道家思想的问题。丁原明的《黄老学论纲》对黄老学的形成及其内部流派有详尽的辨析，书中涉及黄老学在西汉前期的演变。侯外庐等的《中国思想通史》第二卷对汉初儒道之争的背后动机有比较仔细的讨论，对东汉后期道家的影响也较为关注。徐复观的《两汉思想